

历史比较研究法

周谷城题



主编 葛懋春 姜义华
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



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

葛懋春 姜义华 主编

历史比较研究法

项观奇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

葛懋春 姜义华 主编

历史比较研究法

项观奇 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2插页 35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

书号 11275·22 定价 2.75 元

说 明

历史科学在发展，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相应地在地发展。近年来，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几次史学会议上都提出并探讨了这个问题。大家除强调加强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意义外，还就如何着手工作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重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著；深入研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建国后史学发展中所提出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了解、研究、借鉴当代外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等等。为此，一些同志已分别在进行工作。我们编辑《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也属于这些设想的一部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暨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在京举行，会议期间，白寿彝先生曾邀集一部分从事或关心史学理论教学、研究工作的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门就加强当代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认真开展这一工作非常重要，它将有助于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的开展，有助于我国历史科学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洪流中向前飞跃。大家建议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首先按专题有计划地翻译近年来国外有关的重要论文，分集出版，再选择一批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专著，翻译介绍

到国内来，在此基础上，编出一些我国学者专门研究当代外国史学理论的论文集。

为了切实做好丛书的选题、翻译、编辑工作，由我们两人会同南京大学茅家琦、上海社会科学院董进泉、山东大学项观奇组织起一个编辑小组，负责统筹规划、组织联络和编辑定稿事务。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初步确定这套丛书先行编辑三部译文集和一部论文集。这部《历史比较研究法》即是其中的一种。由于各方面大力支持，其他几集的编辑工作也正在顺利进行中。

这部《历史比较研究法》，共编译外国学者的有关论文十九篇，按内容分作三组。第一组八篇，论述历史比较研究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第二组四篇，分别介绍苏联与美国历史比较研究发展的状况；第三组七篇，是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课题的代表性论著。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论点或有不正确的，仅供大家阅读参考。由于水平所限，编选与译校必有许多不当之处，恳切希望关心这项工作的同志予以指正，并对如何进一步做好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周谷城教授热烈支持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亲自为本书封面题签；朱寰教授曾为本书编选工作提供过许多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葛懋春 姜义华

1984年8月16日

目 录

· 社会科学中比较研究的发展阶段

.....〔苏〕Θ·Π·麦尔高尼扬 董进泉译 (1)

列宁的历史类比和对照方法

.....〔苏〕A·A·斯塔尔琴科 范达人译 (42)

· 历史比较法

.....〔苏〕B·B·伊万诺夫 范达人译 (61)

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

...〔苏〕Θ·C·马尔卡良 郭师稷译 李春隆校 (72)

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捷〕密罗斯拉夫·荷罗赫 范达人译 (94)

比较史学之方法

——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

.....〔法〕马克·布洛克 齐建华译 罗旭校 (103)

马克·布洛克与历史比较的逻辑

.....〔美〕小威廉·西威尔 朱彩霞译 范达人校 (146)

历史比较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美〕萨达·斯哥克波尔 玛格丽特·萨默斯

.....周启朋译 周珏良校 (161)

苏联历史科学中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苏〕Θ·Π·麦尔高尼扬 董进泉译 (195)

美国比较史学

……〔美〕彼得·科尔钦 朱彩霞译 范达人校(258)

比较史学的论证

……〔美〕雷蒙得·格鲁 张云秋译 王彦彬校(285)

比较史学

〔美〕乔治·M·弗雷德里克森

……司美丽译 范达人校(311).

关于历史比较综合法问题

——以东方落后民族的民族志学报道为例

……〔苏〕A·N·佩尔茨 白玉译 陈旭晟校(333)

社会科学中历史比较综合研究

——中欧和东南欧各民族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介绍

…〔苏〕Л·Ф·马尔科夫 郭师稷译 李春隆校(356)

关于我国历史学中研究俄罗斯和西欧封建制度的历史比较方法问题

……〔苏〕Л·B·切列普宁 白玉译 陈旭晟校(382)

从历史比较角度看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十六——十七世纪)

……〔苏〕Л·B·切列普宁 B·T·帕舒克

董进泉译(403)

十六——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比较研究

……〔苏〕И·A·巴尔格 董进泉译(423)

日、英两国的教育与近代化比较研究

……〔美〕M·詹森 L·斯通 王建华译(456)

论比较方法在文化史认识中的作用

……〔苏〕Э·C·马尔卡良 董进泉译(474)

社会科学中比较研究 的主要发展阶段

〔苏〕Э.П.麦尔高尼扬

董进泉 译

十九世纪以前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研究

比较是认识周围世界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手段之一。尽管历史比较以前也应用甚广，在整个历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方法是上个世纪才形成的。

远在古代，就已经可以看到进行历史比较的尝试。

希罗多德（公元前495*—424年左右）的《历史》一书中有大量的比较评述，因而可以把它看做对各民族文化，首先是它们固有的风俗进行比较研究的最初的系统尝试之一。例如，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二卷中所作的比较，就他来说是很典型的。希罗多德指出了埃及人和希腊人文化的许多共同点和不同特点。就此，他写道：“还有一种风俗，在希腊人中只有拉凯戴孟人和埃及人一样：年轻人遇到年长的人时，要避到一旁让路；而当年长的人走近时，他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埃

* 原文为“公元前495”年，应为公元前485年。——译者

及人还有另一种希腊人任何地方都不知道的习惯，那就是路上的行人相互不打招呼，只是把手伸到膝头的地方表示行礼。”〔1〕

古代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在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也多次作历史比较。例如，他围绕斯巴达和雅典对待同盟者的政策对两者所作的比较，就是很有趣的。修昔底德指出，拉凯戴孟人不向同盟者征赋，而仅限于要求他们支持寡头统治制度，而雅典人则相反，不仅扣押了盟国的船只，而且还向他们征收货币贡赋。〔2〕修昔底德正是用两国政策的比较分析揭露出来的事实，来说明斯巴达人后来取胜的原因的。

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作历史比较的例子。亚里士多德学派研究和论述了一百五十八种古代政体。他的《政治学》就是仔细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文献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不是对理想国的抽象描绘（他模仿柏拉图提出了这种理想国），描绘理想国也不是《政治学》的主要任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对现实的具体研究，是对于他自己从周围所观察到的奴隶制国家进行的研究。〔3〕这种对于具体实际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使亚里士多德有局限于仅仅一般地提出“最优国家制度形式”的问题。他号召明确说明什么形式的国家制度方才最合乎希望，什么样的形式最适合于什么样的国家，接着又说明，“还应当了解最适合一切国家的国家制度形式”〔4〕。

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经看到，他试图认识现象及一种现象为另一种代替的规律性。而在古代最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波利比阿（公元前210〔203〕—122〔121〕年）的著作《通史》一书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波利比阿在对希腊

人和罗马人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划分出了三种国家政权形式：王国、贵族制度、民主制度。波利比阿认为，这些是优良的形式。此外，他还划分出了不良的形式——君主制、寡头制和暴民政治。同时，波利比阿指出，这些形式按照自然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王国蜕化为君主制；寡头制是贵族制度的歪曲形式；暴民制度则是民主制度的歪曲形式。波利比阿在总结他关于统治形式及其更替的观点时写道：“这就是国家生活的循环，这就是统治形式据以变化、互相过渡和周而复始的自然秩序。”〔5〕这便是波利比阿对历史过程一般进程的看法。这种看法，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波利比阿是在作品中最早对历史循环论作了论证的古代思想家之一。

同一历史时期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86年）正在写《史记》。H·И·康拉德的作品指出，这一著作也是用历史循环论来解释历史的规律性的。在这两位历史学家那里，循环论都是通过权力哲学展开的历史哲学；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了研究了权力哲学。“波利比阿的出发点是这种权力由谁来代表——由一个人、一个集团还是群众来代表；司马迁则从这种权力是从什么出发。希腊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多少人统治，结果是什么；而中国历史学家关心的则是治人者依据人们身上的什么东西。”〔6〕作者详细分析了这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在结论中对他们阐明的循环论作出评价说：“因此，我认为，这两位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对政治权力的历史变化的看法，相应对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看法，是建立在循环形式上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它已不是简单的重复原有事物，而是具有不同内容的重复。换句话说，他们的辩证法不是形式的，而是真实的，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历史的。”〔7〕

由于过去的思想家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建立在人性相同和历史过程不断反复的假设上的，因而他们进行比较的重点主要是寻找被研究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的某种相同点。古代历史学家根据社会关系相对不变来观察历史现象，并试图对历史现象作出因果说明。因此，他们虽然把历史看做有规律的过程，但整个说来，还不懂得历史向前发展的观点。对此，И·С·康恩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叙述各种事件，用人类在具体情况下的动机的逻辑来说明这些事件，但在关于具体行为的故事背后，却没有社会制度和各民族等等的起源史。它们被假定是一成不变的。同自然界一样，社会不是向前发展的，而是循环的。就象太阳升降、冬夏交替一样，历史是不断的重复，古代思想家不懂得整个历史过程的‘目的’和‘方向’，认为历史主要是一连串个别事件。”〔8〕恩格斯指出：“当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类本质的普遍属性的唯一形式的时候，根本谈不到社会史。因此，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也不能够表现出任何社会的发展。”〔9〕

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随着启蒙运动而来的。启蒙时代在欧洲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首先应当指出，正是在这一时代，社会科学中出现了进步的萌芽，因此，人类历史开始被看做人类通过一定的共同阶段而向前发展。当时，同传统的政治史相抗衡，涌现出了第一批研究文化史的著作。在有目的地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历史上不同文化的共同点和特点的形成过程的影响方面，相应地在对历史上的不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方面，跨出了最初的重要步伐。提出这些任务决不是偶然的，它受到各种因素的推动。其中首先是地理大发现迅速扩大了历史视野。欧洲人由

于地理大发现而同许多前所未知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具有特殊的“异国”文化的各民族发生了冲突。认为全人类文化是形形色色民族创造活动的成果，这种观点逐渐开始形成起来了。应当认为，科学知识本身的发展，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过程的观点，从自然科学领域内传播开来，这是对广泛进行历史比较发生兴趣的另一个决定因素。

启蒙时代历史观的基础，是将人性和人的心理看作统一体。这一点，对于理解启蒙时代的历史观特别重要。对欧洲文化同其他文化的大量比较，首先是为了揭示人类的共同性。德国历史学家T·席德尔指出：“这个永远与自身同一的人无非是启蒙文化的人，这一点，是十八世纪的历史学家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首要认识问题。如伏尔泰，倒不如说他力求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去发现启蒙文化的‘共同因素和对应因素’，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一种万能的历史，而这种历史的标准（范例）和主要尺度，是人对教育的追求。”因此，这位作者作出结论说：“启蒙史学不懂得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方法。比较几乎成了本能地用范例来证明某种观点的手段。”〔10〕接着，作者分析了启蒙史学（包括德国史学在内）两种突出的比较方法的主要形式。一种形式是上述范例比较，它力求确定被当作普遍规律的现象的同一性；另一种形式，则是力求从相同点出发推论未知事物的类比。这种比较的基础，也是把同一看做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席德尔得出结论说：“依据一种已经发现的同一，以及个别的具体的情况之间的同一，来推论出其他一切情况下也都同一，这时，类比就不经任何过渡而成了概括性比较。”〔11〕

这就是比较方法据以形成的启蒙时代历史观的某些特点。应当指出，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力求把历史看做一种客观

过程，找到决定这一过程的规律，指出历史过程的典型特点。他们坚定不移地运用比较方法的根由首先就在这里。这种比较方法的主要认识作用，是建立普遍的历史图景，显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例如，在《论各民族的风俗、精神和主要历史事件》中，伏尔泰进行了大量比较，其目的就在这里。他不仅指出了东西方各国的差别，如宗教差别，而且指出了它们共同的社会因素。按照伏尔泰的观点，忽视东方民族的历史是不能容许的。他认为，应当在世界史范围内来研究东方民族的历史。这一切，使科斯明斯基院士有理由公正地指出，这一著作“确实是第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在这里，伏尔泰同号称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决裂了，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而且叙述了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历史。”〔12〕

启蒙思想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孟德斯鸠、狄德罗、爱尔维修，也要求对各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的创作特别有意义。他在主要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认为，比较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本质的最好方法。他写道：“当我回顾古代，我便追寻它的精神之所在，以免把实际不同情况当做相同，或是看不出外貌相似的情况之间的差别。”〔13〕

上述著作中，有许多篇章用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这可以作为广泛运用比较方法的例子。孟德斯鸠对古代希腊、罗马、叙利亚、埃及、中国及欧洲各国的历史具有深湛的知识，并对它们作了比较研究，因而能够就地理环境对世界历史过程及不同文化类型各自的历史特点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最广泛的概括。正是由于对生活在不同气候中的不同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孟德斯鸠才得出了下列结论：“炎热国家的人

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就象青年人一样勇敢。”〔14〕他对印度文化的某些特点所作的说明，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例子：“印度的立法者佛顺从自己的感觉，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但是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懒惰产生的，却反而助长了懒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害。”〔15〕气候条件不同也是孟德斯鸠用以说明某些民族为什么存在奴隶制的理由。他在与认为“有天生的奴隶”的亚里士多德论战时说道：

“有的国家天气酷热，使人们身体疲惫，并大大削弱了人们的勇气。所以只有惩罚的恐怖才能强迫人们履行艰苦的义务。因此，那里的奴隶制对理性的伤害较少……。”〔16〕

这种片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尽管有种种缺点，孟德斯鸠的观点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此，M·П·巴斯金正确地指出：“孟德斯鸠恰恰想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理论结论。那怕他的结论带有根本性的缺陷，但他力求分析社会生活问题的本质，把过去和现在当作实际存在来研究，而不是从某种抽象纲领角度来研究，这件事本身就揭开了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思想史上的新篇章。”〔17〕

论及当时进行历史比较的情况，首先必须指出，从古代思想家起，直到启蒙时代的活动家为止，他们都缺乏对历史客体进行比较研究的恰当的科学标准。众所周知，没有恰当的、有科学根据的标准，就会使比较研究的程序失去价值和效果，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概括和错误结论打开缺口。正因如此，M·M·科瓦列夫斯基正确地指出：“孟德斯鸠的方法，象他的先辈——从亚里士多德起——的方法一样，与其说是历史比较方法，不如说是对比法。”他接着指出，在孟德斯鸠那里，“路易斯安那的野蛮人，和他同时代的荷兰人与威尼斯人一样，都

只是他的思想的例证。”〔18〕英国研究者E·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十八世纪使用这种方法的情况作了类似的评价，认为它“与其说是比较方法，不如说是例证方法”〔19〕。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利用的事实材料不完备，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历史比较，在上述时期社会历史思想发展的总过程中，也起过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它们为研究者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有助于克服历史偏狭性，有助于制定既包括欧洲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历史观。

谈到这一时期运用比较方法的情况，尤其必须强调指出，意大利著名思想家G·维科的观点，整个说来，它正是从启蒙思想发展的总轨道中产生出来的。

维科的主要著作《论各民族本质的新科学》贯穿着这样一种观点：在人类历史的变动性和偶然性的图景背后，一切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具有共同的规律。维科认为，历史的统一性是由不变的人性决定的。按照他的观点，不管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彼此如何不同，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本质。这种共同本质在于人人都有三种共同的风俗：人人都信仰宗教，都缔结隆重的婚姻，都要埋尸九泉。

尽管维科企图揭示各国历史发展共同本质的历史观在当时来说是深刻的，但是这种观点把他所划分的历史周期的重复性绝对化了。这种历史周期由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没有国家制度）、“英雄时代”（贵族治国形式）和“人的时代”（民主治国形式）组成。维科认为，各民族的前进运动都经历着“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的世界所曾经历过的三个时代，

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因为我们看到，各民族永远循着这一贯的从不破坏的因果次序而具有三种本质，并从这三种本质中产生三种风俗，从这三种风俗中产生三种自然法，而相应于这三种法，形成三种市民状态，也就是国家。”〔20〕

维科认为，每个周期结束的特点是出现危机的形势，这时社会崩溃，道德和精神价值败坏，因而圆圈似乎是封闭的。维科的方法有一个优点：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他对研究对象使用了明确的比较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具有形式主义的性质。

维科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的历史感使他分清了某些民族和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致混淆。但他在比较时，虽然相当明确地区分了古代罗马和西欧历史的各个阶段，在对它们共同经历的所谓三个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时，却把从这些阶段中离析出来的历史组织等同起来了。由于这样进行比较，他确定了被研究现象之间的许多形式上的雷同，这也就是维科使用的历史比较研究法最重要最根本的缺点。

因此维科观点中突出的社会循环思想，便完全是他对历史比较对象采取这种态度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对此，彼得罗夫说道：“维科虽然认可每个周期范周内的发展，却不容许有进步思想存在的余地，因而社会运动注定是永远循环的。”〔21〕

应当指出，文献中已经多次指出，这样绝对的评价维科的观点是不合理的。O·П·魏因什泰因指出：“人们通常把消极反动的循环论同进步思想对立起来。这对维科来说并不完全正确。他的周期同向前发展是相容的，因为接踵而来的每一个社会发展周期是在更高阶段上进行的。”〔22〕H·И·康拉德根据同一理由指出：“但是必须考虑到，按照维科的观点，每一

次衰落使人类陷入更深的野蛮状态，相应地每一次上升也使人类走向以前所没有达到过的新高度。因此，维科认为，历史的进程不是按照封闭的圆圈进行的，而是螺旋式地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同一事物那怕以不同形式的永恒重复，而整个说来是向前发展的。”〔23〕

维科的全部观点虽然有上述缺点，但它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用B·马克西莫夫斯基的话来说，在维科那里，可以看到“从经济上说明历史的萌芽，阶级斗争理论——并且相当多——的萌芽，以及朴素的粗糙的辩证法。”〔24〕必须指出，马克思对维科的著作评价很高，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道：

“在维科那里，以萌芽状态包含着沃尔弗（《荷马》）、尼布尔（《罗马帝王史》）、比较语言学基础（虽然是幻想的），以及还有不少天才的闪光。”〔25〕

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中制定和使用

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前提

应当认为，人类进步的学说，是制定历史比较方法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之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开始被看做自文明出现到这一时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前进运动。进步论于十八世纪在赫尔达、孔多塞等人的著作中形成后，十九世纪表现在许多大思想家、尤其是孔德的哲学体系中。

按照孔德的学说，社会发展服从于和自然界相同的规律，因而社会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他说：“实证哲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承认一切现象都服从自然规律。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是发现这种自然规律并把它们归结为最低限度的几个。”〔26〕